



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

人物文集系列

朱峙三日记

(1893—1919)

胡香生 辑录
严昌洪 编

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

人物文集系列

朱峙三日记

(1893—1919)

胡香生 辑录

严昌洪 编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朱峙三日记(1893—1919)/胡香生辑录,严昌洪编.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7

(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人物文集系列)

ISBN 978-7-5622-5123-1

I. ①朱… II. ①胡… ②严… III. ①朱峙三(1886—1967)—
日记—1893—1919 IV. ①K82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16260 号

朱峙三日记(1893—1919)

辑录者:胡香生 ©

编者:严昌洪

责任编辑:郭志刚

责任校对:刘 峰

封面设计:罗明波

编辑室:文字编辑室

电话:027—67867369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 152 号

电话:027—67863426(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传真:027—67863291

网址:<http://www.ccnapress.com>

电子信箱:hscbs@public.wh.hb.cn

印刷: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督印:章光琼

开本:640mm×960mm 1/16

印张:34

字数:513 千字

插页:4

版次:2011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 000

定价:98.00 元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欢迎举报盗版,请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总 序

章开沅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就是辛亥百年。作为辛亥革命的研究者，我自然感慨万千。

首先想到的，就是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说的那段话：“十八世纪之末，十九世纪之初，专制仆而立宪政体殖焉。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经济问题继政治问题之后，则民生主义跃跃然动，二十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擅场时代也。”

过去有些论者，常常讥刺孙中山为空想主义者，其实大谬不然。他脚踏实地，实事求是，时时事事都从实际出发。他不仅密切关注现实，还关注历史，更关注未来。他没有把西方现代化看作完美无缺的样板，更没有机械地照搬西方政治模式，而是在总结既往百年世界历史的基础上，对西方的先进文明有所选择“因袭”，更有所斟酌“规抚”，从而才完成新的“创获”——“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他历经千辛万苦，终于领导中国人民推翻君主专制，建立民主共和，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百年锐于千载”是孙中山对于同盟会成立以前那一百年世界历史的精辟概括，其实这句话也可以形容同盟会成立以后这一百年的世界历史，因为20世纪的“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等，其变化的幅度之大，速度之快，更远远超越了19世纪那一百年。我很重视“百年锐于千载”这句话，认为只有透过这前后两个一百年世界历史的发展变化，才能更为深切地理解辛亥革命。

我们钦佩孙中山，因为他在伦敦总结 19 世纪百年历史并思考人类文明走向时，并无任何具有实力的社团作为依托，主要是时代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督策使然。他在大英博物馆漫游书海，几乎是孑然一身，固守孤独。然而他并不寂寞，他的心与祖国、与受苦民众联结在一起，同时也与世界各地善良的同情者联结在一起。他把祖国命运放在世界命运中间认真思考，并且像耶稣背负十字架一样，心甘情愿地承担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沉重课题。

我们钦佩孙中山，还因为他在百年以前思考的问题、探索的思路以及追求中国现代化的各方面实践，都已经成为宝贵遗产，在此后百年的中国历史进程中或多或少产生影响。辛亥革命不仅仅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它更是一个伟大的社会运动，并非起始于辛亥这一年，更非结束于辛亥这一年。像任何历史上发生过的社会运动一样，它有自己的前因，也有自己的后果，而前因与后果都有连续性与复杂性。我们不是辛亥革命的当事人，没有任何亲身的经历与见闻；但是作为后来者百年以后看辛亥，可能对当年的若干重大问题观察得更为客观、全面、深切，其原因就在于我们探索其前因后果的连续性与复杂性，具有更多的方便条件。

因此，我们反思辛亥百年，应该在连续性与复杂性方面多下工夫，换言之，就是在时间与空间两方面作更大的扩展，以期形成长时段与多维度的整体考察。

仅以三民主义为例，就能引发许多新的思考。

首先是民族主义，过去的研究多半侧重于“排满”问题的实质探讨，而有意无意冷落了对“五族共和”的阐释。其实，在中华民族作为国族认同方面，辛亥那一代人不仅开创于初始，而且还在政治、制度、政策乃至文化诸层面有持续的探索性实践。应该承认，孙中山及其后继者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方面也有不同程度的贡献，至少我们在中华民族作为国族的总体观念上与前人是一脉相承的。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在增进民族平等、团结，发展民族地区经济、文化，乃至促进少数民族内部社会革新等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绩。但是，在民族认同与民族团结方面仍然存在着若干问题，仍然需要从历史到现状进行系统的梳理与总结。

作为历史遗产，辛亥革命也有负面的因素。为鼓动民众推翻清

王朝而狂热地鼓吹“排满”，显然对早已存在的大汉族主义或汉族中心主义有所助长，长期以来，无论是在对历史还是对现实的看法中这些经常会有意无意地显现。即以 20 世纪初期革命报刊极力制作宣扬的“黄帝文化”而言，至今我们一味“弘扬”而未能有所“扬弃”其汉族中心主义内涵。所以我自去年以来不断提倡“新黄帝观”，即给始祖文化符号以更具包容性的诠释，这样才能更为增进对中华民族作为统一国族的认同，可能也更符合孙中山“五族共和”的积极意蕴。

其次是民权主义，回顾过去百年，也会有许多新的认知与感受。辛亥革命使共和国从此深入人心，此话不错亦非虚，但这次革命也仅仅是开启了共和之门，迈出了走向共和的第一步。就以孙中山自己为例，他对“五权宪法”的创建寄予很高期望，曾经明确揭示：“以三民主义为立国之本原，五权宪法为制度之纲领。”但是，对于这个理念懂之者不多，应之者甚少，连孙中山自己也还缺乏相关的架构设计。直到 1920 年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并就任非常大总统之后，孙中山才逐步把“五权宪法”从抽象理念形成完整的国家体制框架。概括起来，无非是：（1）以“权能分离”作为理论基础；（2）“五权分立”具体化，成为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五院政府的架构；（3）进一步确定县一级实行选举、复决、罢官、创制等直接民权，每县选代表一人，组成国民大会代表全国人民行使政权，并授权中央政府行使治权。他认为，如此既可防止议会专制，又可杜绝政府腐败；既可实现直接民权，又可实现“万能政府”，堪称民权主义的完美境界。

但是，“五权宪法”倡议以来，孙中山却未能在生前实施自己的方案；而国民党定都南京以后，所谓“五权分立”的推行也是举步维艰，其后逐步演变得荒腔走调，更非孙中山所能预料。应该说，“五权分立”的立意还是积极的，即为了防止西方议会、政党政治的弊端，将考试权从行政权中分出，监察权从立法权中分出，借以寻求更为完善的权力相互制衡。国民党内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服膺者也并非都是虚应故事，其中确实有些忠贞之士满心期望通过“五权宪法”的实施，把中国引向民主与法制的进步道路。但是，任何良好的民主政治设计，都改变不了国民党政府“党治”、“军治”、“独治”的严酷现实，“五权分立”的政治架构只能

流于虚有其表的形式。这种披着“五权宪法”外衣的威权统治，在1949年以后随着国民党的失败而转移到台湾。直到蒋介石死后，迫于内外形势的急速变化，蒋经国在临终前解除了党禁、报禁与戒严，这才结束了蒋家王朝的威权统治。正是在此以后，“五权宪法”、“五权分立”才真正在台湾的政治实践中受到全面检验与不断修正。

无论西方与东方，特别是在东方，民主政治在任何国家的成长、完善，都必然要经过一条漫长、复杂、曲折而艰苦的道路。中国长期处在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统治之下，从来没有什么议会政治的传统。过去认为这是一个优点，其实这只是有利于“枪杆子里出政权”，政权的更替只能通过武装斗争，别无其他良策。现今，国家已经富强，并且逐步走上民主与法治的轨道，我们应该更加尊重前贤追求民主法治的真诚努力，从他们留下的经验教训中吸取智慧，走出政治制度改革的瓶颈，建设更为完善的中国先进政治文明。

第三是民生主义，这是孙中山最具前瞻性的思想遗产，也是当时最为曲高和寡的政治主张，但在百年之后却成为中国与世界面临的最为紧要的严重问题。孙中山师法亨利·乔治与约翰·穆勒，同时又从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以及均田、公仓等方案中受到启发，提出“平均地权”以谋防止资本主义贫富两极分化的弊害。孙中山自信“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过去曾被讥评为徒托空言，其实他和他的后继者在这方面还是做过多方面的探索与讨论，积累了颇为丰富的经验教训。“民生”一词，从经济而言，涵盖发展与分配两个方面，这就是孙中山所说的“欧美强矣，其民实困”。20世纪初始，中国资本主义还处于极为幼弱时期，1905年提倡“节制资本”诚然是“睹其祸害于未萌”，但现今对于中国而言则早已是严酷的现实。我们虽然标榜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并未能置身于资本主义“祸害”之外，而双轨制经济并存衍生的权钱交易，更使这种“祸害”愈演愈烈。因此，最近几年，政学各界及媒体、网络苦心焦虑，“民生”一词遂成出现频率最高的话语之一。

孙中山及其后继者设计的多种具体方案，已成明日黄花，很难解决当前社会深层转型的复杂问题，但“一手抓土地流转（平均地权），一手抓投资调控（节制资本）”的思路仍然可以对我们有所启

发。孙中山是农民的儿子，他对贫苦民众有本能的同情；他自己又在海外生活时间甚久，对资本主义社会弊病理解最深。这样的领导者，郑重提出的政治设计必定有其现实根据，更有丰富的思维蕴涵，我们理应加以珍惜，作为当前排难解纷的借鉴。

最后还有孙中山晚年对世界主义，特别是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关系的思考，经过百年世界风云变幻的映照，在全球化浪潮已经席卷世界各地的今天，仍然可以发人深省。

孙中山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临终仍不忘呼唤：“和平，奋斗，救中国。”他又是伟大的国际主义者，从革命一开始就谋求国际合作，而且晚年还更为热忱地呼吁建立一个和平、公道、合理的世界新秩序。他为人题字，书写极多的就是“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他应该是近代中国最高层政治领袖中堪称“世界公民”的第一人。

晚年的孙中山，不再简单地以东方、西方或者肤色差别划分世界，而是把世界区分为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两大阵营。他呼吁全世界“受屈人民”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而所谓“受屈人民”，不限于被压迫民族，也包括压迫民族中的“受屈人民”，以及虽已强大然而真诚支持世界各国“受屈人民”的苏联人民。他甚至天真地把“苏维埃主义”与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等同起来，劝说日本“联苏以为与国”，共同支援亚洲乃至全世界“受屈人民”的反帝斗争。这可以认为是孙中山民族主义的又一次升华。

孙中山以“恢复中华”作为自己革命生涯的发端，但是从来没有把民族主义的范围局限于中华，更没有以此作为终极目标。他认为民族主义乃是世界主义的基础，因为被压迫民族只有首先恢复民族的自由平等，然后“才配得上讲世界主义”。他期望以苏联人民作为欧洲世界主义的基础，以中国人民作为亚洲世界主义的基础，然后扩而大之，从而实现整个人类的世界主义。

百年以来的世界，风云变幻，日新月异。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冷战与后冷战的国际格局演变，与孙中山的理想相去甚远。但是他的总体思路，特别是有关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关系的深沉思考，并非纯然是美好的空想，仍然有许多值得重视的现实依据。在全球化潮流席卷整个世界，人类已经进入网络化信息时代的今天，正确处理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的关系，仍然是极为复杂而又必

须回答的重要问题。当前某些政论家正在构思的所谓“全球地方关系（global-local relationships）”或“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与孙中山的思路正相呼应，似乎一脉相承。

举一反三。中国现代的历史叙事，党派成见影响甚深，意识形态束缚尤多，所以很难求得客观、公正、深切的理解。必须以更为超越的心态、广博的胸怀，把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并真正置于世界之中，作百年以上长时段的宏观考察与分析，才可以谈得上史学的创新。思想的解放，对中国、对世界，于学术、于现实都大有裨益。我认为这是对辛亥百年最好的纪念。

在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之际，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在学校出版社的鼎力支持下，隆重推出了“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其中包括学术研究系列和人物文集系列，总计多达30余种著作。这套文库的出版，称得上是一项规模较大的学术文化工程。尽管由严昌洪教授担任主编的十卷本《辛亥革命史事长编》等新书未收入文库，而是由其他出版社出版，但这套文库仍然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多年以来华中师范大学在辛亥革命史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果。

从1978年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成立辛亥革命史研究室，到20世纪80年代初由原国家教委批准建立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再到2000年成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而改名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数十年来虽历经人事更替与诸多困难，但辛亥革命史始终是我们的重点研究领域之一，其间不断有新成果问世，研究所一代又一代学人为之付出的心血，从现今出版的这套文库更不难窥见一斑。

当然，这套文库所收录的著作，无论是学术研究系列还是人物文集系列，都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不尽完善之处，希望能够得到海内外学者的批评与指正。

关于《朱峙三日记》的说明（代序）

章开沅

朱峙三先生是与我交往较多的辛亥老人之一，擅长书画，勤于治学，日记终身不辍。1955年自行整理汇集，日记已有一百零四册之多。朱老热心近代史事研讨，曾多次邀我前往阅览，颇有选编付梓之意。但限于客观条件，岁月荏苒，直至老人病逝，这部日记一直未能问世。幸好其子胡香生同志珍惜先人手泽，历经“十年动乱”，保存完好无缺。现由香生先将癸巳（1893）至己未（1919）27年日记择要辑录，以供研究此段史事者参考。朱老地下有知，当亦深感欣慰。

朱老自幼热爱祖国，关心时事，举凡近代重大事件，如甲午战争、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赣宁之役、讨袁战争等等，在日记中均有所记述。诚如他自己所言：“予日记内容在清代者，如朝廷掌故文献，君后之败废荒淫，官吏昏庸贪墨，以及国家贫弱缘由，革命党会潜伏，内政外交、邸抄文告，凡可记者，即民间轶闻亦悉载之。”

但是恕我直言，读者不可指望在日记中能看到诸如宫廷秘闻、政党内幕之类的奇特记载。在上述那些重大事件中，朱老并非什么核心人物，甚至大多也并非亲身参与者。他从来不是风云际会的英雄，而只是作为一个普通的正直的知识分子，忠实地记录下身边的所见所闻，包括自己当时的思想活动。也正因为如此，这部日记便区别于一般的史事记载，它的史料价值在于比较具体地叙述了历次重大事件在民间的反应，保存了不少普通老百姓当年的原始议论，

这些倒是在一般官方文献和显赫人物回忆录中所难以见到的。

作者曾担任过《中西日报》、《公论新报》的主笔（即社论撰稿人）和编辑，他具有新闻记者的社会视野和采访的经验，因而日记的许多内容颇有助于我们对清末民初社会环境的了解。迄至己未年（1919年）为止，作者长期僻处鄂城（清末原称武昌，民初曾一度改为寿昌）家乡，行踪所至无非是武汉、黄安（今红安）、大冶数地，至于开封、南京、九江、南昌、北京等省外城市均属短暂逗留。可以说，他的亲身见闻主要限于湖北，但其观察社会的细致深入则又多少弥补了地区局限之不足。旧中国基本上属于农业宗法社会范畴，轰轰烈烈的政治事件虽多，社会内部结构的演变却非常滞缓。重大事件易入史书记载，渐进而又细微的演变则往往为人们所忽视，朱老日记的侧重点恰好在于后者，这自然将引起读者的浓厚兴味。比如湖北县城的风土人情、礼俗习惯，私塾、书院、学堂的学生生活，科举考试的繁琐过程与夹带舞弊，穷酸秀才如何到各地打“抽丰”，古董商人如何制作赝品，革命党人在学堂如何秘密活动，县书记官（相当于主任秘书）如何周旋于县衙内外，禁烟委员如何巡阅各乡，虚应故事，以至南洋劝业会的盛况空前，武昌首义之夜的风声鹤唳，鄂城中元、端午两节的灯火、龙舟等等……无不历历如绘，并且带有浓郁的乡土气息。

作者自幼读书，成年后又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日记的选编，有意识地较多保留了这方面的记载。例如，以准备科举应试为宗旨的私塾教育，入塾有哪些礼节，对不同年龄、水平学生的教学如何组织，课程内容、进展程序与教学方法，学费的数额与交纳方式，以及塾师、学生的课余生活等等，均有详尽的叙述。更为难得的是在武昌县师范和两湖总师范学堂期间的日记，对学习期限、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师资状况、学生来源、课外活动诸方面，保存了许多相当具体的记述。这些对于研究清末废科举、兴学堂的教育体制改革，特别是对于研究具有深远影响的“癸卯学制”，无疑很有裨益。民国初年，作者在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鄂城寒溪中学、大冶中学、武昌三一中学、汉阳晴川中学等校任教，日记内容虽然颇多重复且平淡之处，但经过删节也保留了许多有关早期中等教育的原始资料。我相信，这方面的内容将会引起中国近代教育史研究者的注意。

由于作者生长于清寒之家，成年后又常为家庭经济困难所苦，所以日记比较注意银钱数字的记录，诸如银钱比值、借债利率、薪俸工资、文章稿酬、书画行情、车船票价、食宿费用，乃至年节和婚丧开销，一笔一笔都写得清清楚楚，这些数字诚然没有企业账目那么重要，但却有助于了解各个时期的货币、工资、物价。特别是从社会史的角度来说，以此作为普通医生（朱老的父亲是中医）和教员家庭经济的一个个例来分析研究，也是很有意思的。此外，细心的作者还详细地记录了火车、轮船、木船、轿子、独轮车的行程、路线、速度，也记录了县与县之间的邮路和传递方式，这些内容对于了解近代中国内地交通状况的变化，应该也是有参考价值的。

细心人的日记，需要以同样的细心来阅读，才能充分发掘那些细微之处蕴含的社会意义。即以家庭和学校的照明用具而言，作者长期习惯于清油灯柔和而又暗淡的光线，所以开始用煤油灯便觉得非常刺眼，熄灭时气味又很难闻，而及至到教会办的三一中学教书时，则已经习惯于电灯的亮光了。这种个人生活习惯的变异，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与外国石油的倾销和近代市政建设的兴起，都是密切相关连的。人们思想意识的变迁，某些传统思想的隐退，某些近代意识的萌发，也并非在任何时候都通过狂风暴雨式的变革表现出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决定使用公元纪年和阳历，作者对此持冷漠态度，仍然在日记上沿袭干支纪年和阴历月日，所不同的无非是用公元和阳历给予注释而已。可是当中学生兴高采烈地演戏庆祝新年元旦，并且理直气壮地以演戏疲劳过甚为由要求添假一天时，作者这才意识到世事的变化，并且感慨，千百年来清高的“士”是羞于与“倡优”为伍的，可是现在的“士”却以行“倡优”之事为乐了。当然，旧中国的社会进展是相当迂缓的，内地的前进步伐更显得缓慢，日记中那些灰暗的色彩，感伤的情调，松弛的节拍，可说是一个古老民族落后的影子。

我对作者的真率感到由衷的敬佩。他整理自己五十多年的日记，分明是企盼“当道采集”、“代为印行”，但却努力保持当年日记的原来风貌。除了对自己的学业成绩、书画作品和在黄安（今红安）的政绩稍有自炫之意（这也是原始思想）以外，他并未打算把自己写成思想多么高超、功业多么伟烈的英雄。恰恰相反，倒是如

实地记录下自己头脑中那些落后思想以至“不洁之念”，譬如名教观念、迷信思想、迷恋科举、重男轻女、制作前人书法贋品、邀妓女陪同宴饮等等。当然，日记更多的内容是叙述个人和家庭的苦楚，如失业、负债、贫病交加、丧父失子等等，虽有自我怜悯的弱点，但却是旧中国知识分子悲惨境遇的真实记录。不过日记的主要价值并不在这里，它的好处是比较具体地叙述了作者和他的同辈人（如张肖鹄、刘菊坡等），如何经历了科举生涯转入新式学堂，如何逐步改变传统观念接受“排满”革命思想，又如何在武昌首义以后从兴奋转入消沉并出现新的分化……或许可以说，日记粗疏然而颇为生动地勾画出辛亥前后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群像。这些内容将可丰富我们研究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问题的认识，而从真实性来说又要超过若干堂而皇之的所谓回忆录。

年轻的读者也不妨看看这部日记，即令不是从事中国近代史教学和研究的同志，从中亦可吸取某些有益的东西。看看那一代青年走过的道路是多么崎岖坎坷，经历的生活是多么惨淡艰难，这样才可以了然于他们何以那样欢欣鼓舞地迎接全国的解放，何以历尽磨难挫折而仍然那样热爱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从这个意义来说，朱老的日记又可以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辅助读物。嵇三先生是一位爱国的正直的知识分子，由于封建文化习染较深，为人过于谨小慎微，而且受到家庭困难的拖累，在每个历史转折时期都未能跻身先进的行列。辛亥革命前夜，刚接受“排满”思想不久，突然呕血不止，卧病在床，以至未能投身武昌首义，也未能在新成立的湖北军政府中谋得一官半职。辛亥革命失败以后，当友人董必武等继续抗争并寻求新的革命道路的时候，他仍然困于贫病，为一家老小衣食奔忙。直至解放以后，湖北省人民政府任命他担任参事室参事兼文物整理保管委员会委员，生活和医疗有了可靠的保障，他才得以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充分发挥余热，勤奋地工作和学习，直到享有 81 岁的高龄。

朱嵇三先生改变祖国贫穷落后面貌的善良愿望，只有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才逐步化为现实。他非常珍惜革命胜利的成果，并且真诚地想为社会主义建设增砖添瓦。关于这部卷帙浩繁的日记，他也想尽可能使之为社会所利用。他生前曾说：“倘蒙当道采集，认为予此记具有历史意义，列为稗官野乘而代为印行，则朝章国故，民间

文艺，或赖以知；历史沿革，社会发展真相，于各学校授近代史者与社会文艺作家，无不小补也。”我想，日记的选辑出版，正是尊重这样一位爱国老人的遗愿。

日记由于作者本来是写给自己看的，所以文字未经修饰，错字、重复以至语句不够通顺之处常有出现。编选过程中，除作必要的不损害原意的删节以外，一般保持原貌。少数明显的错字、漏字，则在〔 〕号内加以改正增补。日记各页脚注均系作者自己所加，其中有些对今天的读者已无必要者则加以删除。

日记自序

予今年五月初九日七十初度，念自童稚而少壮而老大，其间大病几死者非一次。近五年每以寒暑失度，致痼疾不能愈，一届秋末，效逆甚剧。忆杜甫诗“人生七十古来稀”，予素体弱，虽耳目聪明而精神疲惫，行步龙钟。陶诗所谓“人生不满百”，苏词所谓“来日苦无多”，人固不能越自然界而例外生存者也。况中年伤于哀乐，国难后避寇施州，头童齿豁，忽呈衰老。东归三年，驯至七事相累，境迫桑榆，读书时少。洵所谓时过而后学，则勤苦而难成矣。迩来检所著述，得诗千四百余首，文稿及杂文二百余篇。浅陋之辞，固未敢以作家论也。惟日记之作，始念起于光绪戊戌春间。是时读书五载，每见先师程公松年于其常用书眉上多记年月日时，或间注数语，随时可查证其过去事。予尚童稚，亦戏仿之，以所读四书、唐诗、自订塾课字本，亦记以时日，而时取检察。八九岁所书字课，经师判有月日者，亦积数帙置几上古瓶中，此瓶为先祖父冠群公在道光中年购自本城，余相国柱后人所售者，高二尺（有碎冰），志在永远保存。辛丑春，初从高师读习制艺试帖，底稿誊真[正]后尾必记年月，或以纸条贴小册存之。甲辰以后，另以小本记载尤详。丙午肄业两湖总师范学堂，兼记邸钞与沪汉报社论说（当日报馆称报社，社论称论说，非如今之称谓），随时参与人事评议。民国乙卯，奉讳家居，就近任寒溪中学教员。搜旧时零稿仅存者，整理成册，而完成民元及清代未竣日记。丙辰三月，又补充癸巳至丁酉五年间之事。戊午在金湖中学，举凡清代日记未完者，复一一整理，汇分成册，然非敢问世也。

癸亥供职闽垣，偶借观闽侯张时蕃君所藏《曾涤生手书日记》

影印本，继又得观李蕤客《越缦堂日记》影印本，似与予日记同体例，次年甲子以干支便计算。乃改用大本，为疏朗大字，立志记载不缺月日。几经变乱，幸赖分寄各地，得以保存无失，即现有之六十三年日记也（甲子至庚寅，每年系分上下二册装订）。

夫日记非难事也，在有恒耳。二十年前，见同学刘菊坡、张肖鹄二君日记。刘君或作或辍，仅十余年而止。张则始勤终怠，一二年即止矣。汉川友人严其安，亦有二十余年日记，惟草率殊甚。与予同教三一中学四年，曾阅之，草率之字[至]，本式大小不一。记晴雨气候与时事重要者亦无缺，且多评论，求之近代教师中，亦难能可贵者。予长黄冈时，有法院庭长黄履思，南城人，予曾阅其日记，自民元壬子至甲戌，二十余年所写无缺，且取材宏富，书法秀美。其后调恩施法院未久，值日机轰炸施南城，衣物与日记俱尽，仅以身免，此则最可惜者。黄为清诸生，习法学，其品谊甚好，予因连系叙及之。

予日记内容在清代者，如朝廷掌故文献，君后之败废荒淫，官吏昏庸贪墨，以及国家贫弱缘由，革命党会潜伏，内政外交，邸钞文告，凡可纪者，即民间轶闻亦悉载之。次则诗文书画之品评，音乐戏剧之观听，亦间有类载。五十余年中，国体政治之变更递嬗，因益改革，凡具有历史性者无不搜罗焉。今病小愈，乃汇集幼时日记及现存者，共为百零四册，付予三子保存。倘蒙当道采集，认为予此记具有历史意义，列为稗官野乘而代为印行，则朝章国故、民间文艺，或赖以知；历史沿革，社会发展真相，于各学校授近代史者与社会文艺作家，无不小补也。

一九五五年寿昌老人朱峙三

目 录

关于《朱峙三日记》的说明（代序）	(1)
日记自序	(1)
清光绪十九年（1893 年）癸巳日记	(1)
清光绪二十年（1894 年）甲午日记	(13)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 年）乙未日记	(21)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 年）丙申日记	(26)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 年）丁酉日记	(30)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戊戌日记	(38)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 年）己亥日记	(49)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庚子日记	(56)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 年）辛丑日记	(73)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壬寅日记	(96)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癸卯日记	(104)
清光绪三十年（1904 年）甲辰日记	(135)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乙巳日记	(161)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丙午日记	(175)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丁未日记	(201)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戊申日记	(223)
清宣统元年（1909 年）己酉日记	(241)
清代宣统二年（1910 年）庚戌日记	(256)
清末宣统三年（1911）辛亥日记	(277)
民国元年（1912 年）壬子日记	(319)
民国二年（1913 年）癸丑日记	(373)